

【论 文】

深层面剖析历史， 理性走出历史事件的阴影¹

马 戎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条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历史人物，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谈到，一个人的作用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但是第一，在同一个社会舞台上，许多人都有机会粉墨登场，但是最后究竟由谁扮演了主角，这与个人的特点与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二，这个主角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根据个人的性格和他在权力格局中的权重，会给历史发展的轨迹打上个人的烙印。

1. 各国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重大历史转型的年代，通常会发生一些影响政治局势发展、在当时即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由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而那些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决策性角色的历史人物，很可能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各项具体决策，而受到社会上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政策的转折都必然直接或间接涉及当时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一个历史事件导致的后果、重大决策的社会影响可能比较符合社会中某些人群的期望，但同时很可能遭至另一部分人群的反对。在事件发生之后，掌权的一派必然试图垄断对该事件的解释权，而另外一派的声音则会在高压下暂时沉寂下来，等待下一个历史转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而只要出现适当的政治空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争议就会再次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舞台上。

在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人们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社会场景和自己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作为标准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会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例如我们无法以今天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运行规则去评价一百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作为；二是容易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对前人过于苛求。

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应当如何评价？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社会后果应当如何定论？人们可能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不仅各种观点之间的距离有时会极为悬殊，而且各方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们一谈起来就会十分激动。为了避免使对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争论导致的社会严重分裂，避免民众和精英集团在辩论中感情激化及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冲突，执政当局有时会采取回避讨论这些“敏感议题”的作法，例如采用行政手段禁止新闻媒体公开讨论这些话题，不准出版机构公开出版有关的著作与文章。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暂时控制住事态，但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把矛盾暂时地掩盖起来。

为了化解这些因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为了真正化解民众心里的纠结，为了使那些持不同观点各群体之间出现真正的社会和解，这些问题或迟或早总是需要公开讨论的，需要在各群体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以便共同把历史上的这一页真正地翻过去。但是为了使这些问题的公开谈论引出一个积极的后果，使其真正推动社会和解而不是导致社会分裂，政府和知

¹ 本文刊载于（香港）《领导者》2011年6月刊（总第40期），第164-171页。



识界必须为此进行慎重的思考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准备，就是需要在公开讨论这些敏感问题之前，引导民众和精英分子去“历史地看待历史”。

2. 什么叫做“历史地看待历史”？

首先，要提醒人们要把自己的个人感情因素暂时搁置一边，要努力运用理性思维来判断历史的宏观走向和历史人物在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避免沉陷于一时一事的微观考证，在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要更多地强调科学分析，而不是感情宣泄，要多从“学术”的角度来冷静和客观地思考历史上发生的人物和事件，而不能只是个人感情宣泄式的“声讨”，因为感情宣泄只能激化矛盾而完全无助于对历史事件的整体理解、无助于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和达成共识。当然，对于那些自身或亲友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个人，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从国家、社会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能够用理性战胜感情并说服自己。

第二，要客观地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局限性，而不是简单以今天的政治观念和知识结构来要求前人。毛泽东除了在莫斯科的办公楼里开过会之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也很难要求他去深刻地理解市场经济，理解现代化工厂生产的钢与“土高炉”拉风箱生产的“钢”之间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是军人出身，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在需要动用强制力量来清理街头抗议人群和恢复秩序方面，他很可能并不觉得动用警察和军队之间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第三，对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要做冷静、客观、多方面的分析，要从“事后”社会整体发展的客观效果来分析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处理方法，而不能仅以局部和短期的效果来做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正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必然会受到自身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束缚，正因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也就不可能总是非常理性和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周围的事务，是人就会犯错误。错误有大有小，有关键性错误，有无关紧要的错误。我们必须客观、辩证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否。

第四，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和讨论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这些评价和讨论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警世后人，把这些经验与教训转变为我们的知识宝库，“吃一堑长一智”，使百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能够成为今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借鉴。我不主张那种在讨论历史人物时所持的要求进行“清算”的报复心理。我们对历史进行了客观的、深刻的评价，这页历史就翻过去了。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总想使当时的具体责任人“污名化”、“焚尸扬灰”，并使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如后代）受到严厉的“惩罚”以满足自己的“泄愤”需求，那么很可能又会造成新的不公正，种下新的仇恨。这对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3. 如何引导人们“历史地看待历史”

为了使民众能够真正做到“历史地看待历史”，理性的学者们需要做许多积极的引导工作。首先要介绍对于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导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要从个体的微观层面提升到社会的宏观层面，认识到即使是一个基本正确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有可能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个别无辜者。同时，我们也不妨介绍其他国家处理历史上重大冲突事件的比较成功的做法，譬如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是如何弥合双方的伤痕并促成民族和解的，这些案例将有助于人们开拓视野，提高认识的理性层面。其后，我们可以先从那些不太敏感的、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譬如晚清、民国人物）着手，以此来逐步引导人们的讨论与思维。当社会上已经有比较多的人们开始接受了这样客观、理性的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之后，在社会的理性思维风气占据了媒体和出版物的主流之后，我们再转向对近代敏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讨论，这样就有可能使大多数民众从原来持有的比较激进、感性和简单的思维和评价定式中“解套”。



在一个曾经经历了剧烈社会革命、社会动荡的国家与社会里，要想引导大众客观和理性地讨论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弥合民众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对立观点，使各方在讨论中达成共识，翻开新的历史页章，这样的“解套”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一个社会抛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否则，政府将一直面对民众要求公开评价这些人物与事件上的巨大压力，同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些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才能都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得以真正实现。

要创造一个平和、冷静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来讨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需要培养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一种“历史的眼光”、也就是相对超脱和客观的态度。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应当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坚持学术化，我们要努力用科学和客观的态度、用系统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由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场景中发生的，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打上了当时历史的痕迹，只有用学术性的研究态度，才能做到比较客观和冷静。

第二是必须理性化，也就是要超脱个人感情和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必须开展系统性的理性分析，功过分明，孰轻孰重仔细衡量，不能仅仅抓住若干事实和个别结果就去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做整体和简单的道德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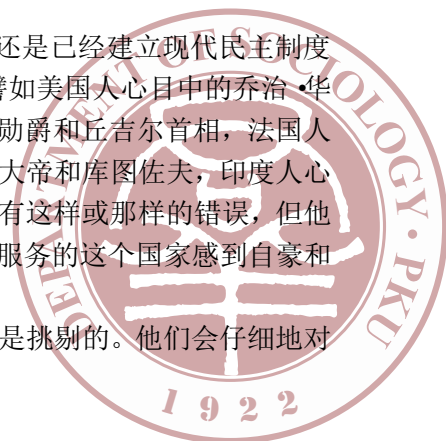
第三是要有一个“向前看”的积极态度，不是要“秋后算账”，也不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具体负责人进行“责任审判”。对于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也许是一些给人们留下伤痛的非常不幸的事件，后人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讨论和处理。一种态度是刨根刨底，要求所有人都跟随着一起去认定那些历史上发生事件的所有细节，要求确定每个环节的具体“责任人”，并坚持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甚至启动司法程序。这样，对历史事件“真相”和人物具体作用的认定，本身必然是一个漫长和充满争议的过程，对所有参与者都起到不断“煽情”的效果，这样的情绪化的争议无疑会毒化社会气氛，对于社会和解和群体和谐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另一种态度，就是采取高瞻远瞩“向前看”的态度，要从系统互动演变的角度和宏观的层面来相对粗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宜粗不宜细，评价的目的是要从他们的功过评议中为后人寻找经验与教训，以便后人可以在未来走得更好。

4. 要注意维护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在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知识分子-精英集团和普通工人、农民、士兵这样两大部分人，知识分子-精英集团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社会结构、制度建设和民主原则有更多的思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社会发展方向有更多的研究，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一般持有更加积极和理性的态度。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忙于日常的生计和劳作，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阅读社会科学的研究经典和文献，所以往往以一时一事的感性认识为主导，难以把认识建立在系统分析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因此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民众的观点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显现无遗。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广大民众心目中存在着稳定的、值得他们信赖的“英雄人物”和真心信仰的价值体系（宗教、意识形态）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长期稳定。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无论是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国家还是已经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民众在感情上仍然需要有“卡里斯马式”的魅力型英雄人物。譬如美国人心目中的乔治·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英国人心目中的威灵顿勋爵和丘吉尔首相，法国人心目中的戴高乐将军，德国人心目中的俾斯麦，俄国人心目中的彼得大帝和库图佐夫，印度人心目中的甘地，古巴人心目中的何塞·马蒂，尽管这些人物生前也曾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获得解放或者荣誉，他们使民众对自己出生和服务的这个国家感到自豪和骄傲，为此民众愿意忽视或原谅这些人物身上的瑕疵。

与广大民众相比，理性的知识分子的目光是挑剔的，而且也应当是挑剔的。他们会仔细地



任何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且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通常对历史人物所犯的过错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无情的批判，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更加健康的发展，都是绝对必须的。但是，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也必须考虑到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心理需求，注意不要在这样的批判中简单地毁掉民众心中的“英雄”偶像。对一个曾经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艰苦卫国战争的民族来说，那将导致一场“信仰”危机和“自信心”的灾难。当一些领袖人物已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成功胜利的象征之后，他们已经转型为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符号”，对这些领袖人物的否定性批判，会使这个国家的民众感到对过去的迷茫和失去对未来的信心。这对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稳定和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5. 评价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必须考虑这样的评价和讨论对本国社会未来发展、社会整合所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才是一个真正对历史、也对现今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

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的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有功也有过，但是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或一个时代的某种象征。如果专注于“挖掘”这些人物的“污点”，这些讨论和审判也许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内部整合都是有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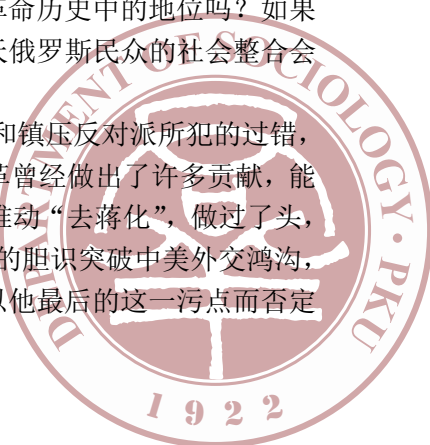
例如：华盛顿将军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美国开国元勋和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伟人之一。但是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揭露了一些事实，表明这位伟人是一个坚持对黑人实行奴隶制的人，不仅自己家里长期蓄有数名黑奴，还坚持拒绝给他们自由。那么，如果不顾当时美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用今天反对奴隶制的人权主义的立场来裁判华盛顿，也可以得出很负面的结论。如果坚持这样去做，对于美国人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

孙中山当年在努力发动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中，为了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据一些学者考证他曾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某些在当时和今天来看都有损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的“秘密协议”。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是否就会因此完全改变孙中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和“国父”的形象？如果不考虑 20 世纪初中国的国情和外交态势，不考虑当时汉族精英们对“民族”概念的混乱定义和粗糙理解，而只是根据这些事件对孙中山进行“污名化”，这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和两岸对话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日本的裕仁天皇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一直存有争议。许多人认为他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战犯，却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东京法庭的审判。但是他后来对战争的态度可能发生了变化，在甲级战犯的灵位被移入“靖国神社”后，他明确表示不去参拜。如果坚持对裕仁在战争中作用的追究（这也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的），而忽视了裕仁这个历史人物在战后行为的变化，那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会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呢？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一度滞留德国，为了及时回到俄国，是否与当时的德国政府达成某种“秘密协议”？当时陷入欧洲战场泥潭中的德国政府非常希望加剧俄国内乱，以此使德军在战场上摆脱困境，在签订了使德国获得最大利益的“秘密协议”后，德国协助或放任列宁回到动乱中的俄国是非常理性的行为。列宁急于回国发动革命夺权，为此与德方签订有损于俄国利益的“协议”也是可能的。假如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这件事会改变列宁在俄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吗？如果今天在俄罗斯民众中再次引发针对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争议，对今天俄罗斯民众的社会整合会产生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对台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和镇压反对派所犯的过错，同样也是褒贬不一，有功亦有过。蒋经国对台湾经济的起飞和政治改革曾经做出了许多贡献，能够客观分析台湾社会发展的人们对此都有共识。民进党上台后，竭力推动“去蒋化”，做过了头，反而导致民众的反感，使自己丢掉选票。美国的尼克松总统曾经以超人的胆识突破中美外交鸿沟，但是后来在竞选过程中却因“水门事件”而身败名裂。难道我们应当以他最后的这一污点而否定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吗？



梁启超先生曾经是激烈反对李鸿章的人，指责他“误国卖国”。在李去世后，梁先生亲自为其写传，有褒有贬，力求公允，他在书中对李鸿章所做诸事时的历史处境表现出充分的谅解。他在《李鸿章传》序中这样写到：“合肥（即李鸿章）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即梁先生）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并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梁启超，2000：1-2）。梁先生所说的他为李鸿章“解免”，我觉得就是从历史来看历史。他提到的“俗论”就是当时咒骂李鸿章的汹汹民众舆论。当斯人已逝，不可能再影响社会政局，我们就应多存仁厚之心，从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来理解其一生作为。“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即是梁启超先生留给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警戒。

对本国重要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如果作得客观和理性，会帮助我们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使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如果作得粗糙莽撞并任由激荡的感情去引领，那么也可能不知不觉间会把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引入分裂和内战的深渊。当我们引导人们去对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仅需要过去的历史负责，我们也要对未来的社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因为我们不想留给他们一个撕裂破碎、人人留有心理创伤的社会生存环境。

6. 苏联简单批判和否定列宁、斯大林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在 50 年代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无论从价值判断的原则还是从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说，斯大林无疑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他在农村集体化进程中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在 30 年代进行了“大肃反”残酷杀害了许多原来的革命战友、无辜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卫国战争期间，他强制许多少数民族迁出他们的传统家园，他在对待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上也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人们也不应忘记，列宁和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和苏联的奠基人。无论如何，在他们的领导下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地主贵族武装和外国干涉军被打败了，斯大林采用专制和集权的方法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西欧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 30 年代使苏联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在短短 20 年间把沙俄时代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建成了——一个坚实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基础，并凭靠这样一个基础打败了在欧洲大陆上所向披靡的法西斯德国，保卫了祖国，并使苏联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享有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尊重。列宁和斯大林在全体苏联人民心目中已经被塑造成全民族的英雄和苏联国家的胜利象征，他们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享有崇高声誉。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简单、彻底地否定了斯大林，也许这些批判都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在原则上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客观上却使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民众中失去信誉，跌入万劫不复的深谷，同时使苏联广大干部民众对整个苏联历史和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产生出这样一个魔鬼领袖并长期掩盖真相的政党，还有权利继续执政吗”？在此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干部民众的威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自 60 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效，也许与苏联干部队伍和广大民众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为了推动他的“改革新思维”，选择从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上入手，他提出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历史上的“痛苦”和“灾难”情况时，“应该表现充分的明确性和彻底性”（刘爽，2009：112）。在这一思路下开展的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导致各种非理性思潮的泛滥。俄罗斯学者在回顾那段时刻时感叹到：“当你浏览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利西奇金，2003：277）。把国家奠基人和长时期引为荣耀的国家历史抹黑成为“魔鬼”和“地狱年代”，我们不难想像，这种对历史的简单否定将使广大国民的心理和自信遭受多么大的冲击。

于是，在许多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斯大林的形象从伟大领袖变成了“专制恶魔”，而苏联共产

党也自然而然地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恶魔”政党和帮凶的角色。这一巨大的思想冲击在当年即导致几百万苏共党员退党。在叶利欣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后，全苏联几乎没有几名共产党员站出来，号召要求保卫这个党。苏联社会就是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争论和裁判中分裂的，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大的宏观政治氛围。

在苏联解体后的这十几年里，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一直在对当年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批判”进行反思。否定斯大林、解散共产党并建立“民主政权”并没有像人们曾经期待地那样使俄国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国家，带来的却是政治的衰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混乱，包括那些当年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都为俄国的衰落痛心疾首。与此同时，人们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对斯大林和列宁重新进行评价。一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前不同政见者、作家季诺维也夫在 90 年代完成的小说《诱惑》中描写了一个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通过激烈辩论宣判斯大林无罪的故事，并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索尔仁尼琴在 1996 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张捷，2007：180-181）。2003 年，“已经有 40% 的受调查者赞成斯大林的活动了。……在 2000 年的十位最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俄罗斯的‘世纪人物’排名中，居于首位的是列宁，第二位是斯大林”（麦德维杰夫，2005：414）。

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里，俄国人先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最后又对他们给予高度肯定。还是同一群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前后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复？这些问题难道就不应当引起中国人的深思吗？我们可以说：俄国人最后是理性战胜了感性，在感受了这一切的后果后，他们才重新理解了前因。我们也需要走上这样一个轮回，才能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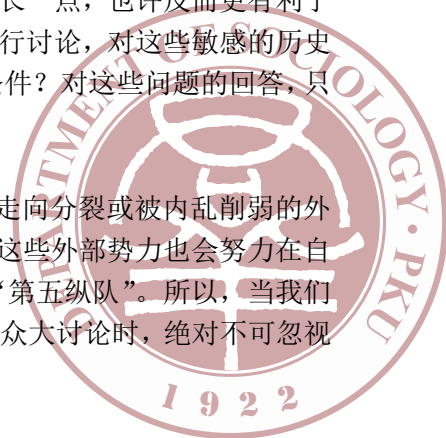
7. 以理性思维评价历史人物，使全体人民从争议中“解套”

如果我们需要对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和历史人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赵紫阳等）进行评价，在开展全民讨论之前，必须考虑社会和民众对此是否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我们没有事先使广大民众从绝对化和感情用事的思想状态中“解套”和“去魅”，中央政府和知识界没有能力和条件引导民众用客观、历史的思维来开展讨论，做不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们没有或不愿对这些事件或人物做全面的历史分析，人们只会从一时一事出发并根据简单的道德判断来得出结论，那么，这样的讨论就必然会引发民众内部的激烈对立、部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对立，社会动荡和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讨论必然难以取得积极的效果。现在中央政府对于有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采取不讨论的态度，很可能就是出于对出现这种消极后果的担心。

但是这样的重大争议既然存在，民众和知识界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得出结论的呼声一直存在，那么拖得时间太长，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从一个方面看，新一代缺乏对当时历史场景、社会氛围的感情经历，可能在讨论中更加难以客观和历史地对这些人物的事件加以理解，“代沟”会使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并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从另一方面看，新一代也可能对久远的人与事产生淡漠感，感情纠葛也可能会淡化，所以拖的时间长一点，也许反而更有利于心平气和地讨论历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究竟选择在什么时候进行讨论，对这些敏感的历史问题做出一个了断？开展良性和理性的讨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通过民众和知识界的广泛调查才能有所了解。

8. 警惕境外势力介入和利用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讨论

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战略对手”，都存在希望这个国家走向分裂或被内乱削弱的外部势力，这些外部势力也许是某个邻国，也许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国。这些外部势力也会努力在自己的“战略对手”内部积极寻找和培育能够分裂和削弱这个国家的“第五纵队”。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何时以及如何对本国有重大争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民众大讨论时，绝对不可忽视



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推波助澜，不要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盲目地被内部要求和外部压力推动着去仓促地进行讨论，从而落进民族敌人预设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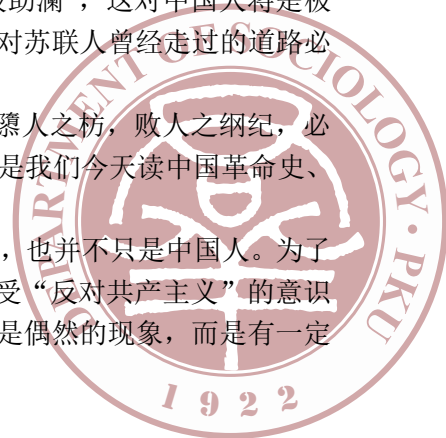
如果准备充分，政府能够实施有效积极的引导，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讨论和总结，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放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进。但是，如果各方面缺乏必要的准备，对那些讨论中将要触及的核心问题，我们并没有能够在深入充分的研究上提出一套在基本价值和感情上都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话语和分析逻辑，那么就可能无法掌握住讨论大方向的主动权。境外势力对这一讨论进程的影响程度，也许会超出我们事先的预料。

俄罗斯学者利西奇金曾经分析过西方国家在鼓励苏联社会“重新评价历史”时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心理战中用历史做武器需要采用一系列具体方法。其中包括颂扬法和妖魔化法，将某些历史人物奉为神明或贬为恶魔，将某些历史时期捧上天或踩下地。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就是重写历史”（利西奇金，2003：39）。在对苏联历史重新评价的过程中，赞扬白军将领邓尼金的文章发表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描绘成有着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的君主，对他全家的处决映射出苏维埃政权的残暴，而列宁则被描绘为“邪恶帝国的精神化身”，“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来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刘爽，2009：90）。在西方国家的鼓励下，一些人“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雷日科夫，2008：18）。而当格鲁吉亚的民族分裂分子公开打出“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和“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的种族清洗口号时，“西方的‘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雷日科夫，2008：48）。正是这些西方的“民主支持者”来到格鲁吉亚的首都进一步推波助澜，使民族分裂的势头不可逆转，并在此后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从这些年我们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出版物的了解来看，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再评价”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口述史研究”，可能是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如认为清朝不是中国皇朝而是异族政权的“新清史研究”，将使西藏、新疆、内蒙古的分裂活动具有某种历史合法性），可能是精心编排的对中国政府相关档案文件的“再解说”，也可能会邀请参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某些当事人出面来“澄清历史”。总而言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符合他们政治目的的对“中国历史事件的再构建”，以此推动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再思考”。这些准备工作，有的是政府机构推动的文化交流项目，有的是由学术团体（如大学）出面组织的合作研究课题，有的是由“非政府组织”主导开展的“维护人权项目”，这些活动通常能够吸引许多国内各界人士和学者参与，有的参与者自身即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有的参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强。许多学者主观上也许并没有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直接动机，但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经在西方媒体和学术出版物中被“定位”和做出“结论”了，相关的“事实”也即将被组合在一起证明这些“结论”。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在形式上松散无序，但它们在本质上确是各有各的功能，配合得十分到位。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新思维”指导下推动的对苏联历史的“再思考”时，西方势力曾经以什么形式和方法来“推波助澜”，这对中国人将是极有教益的。我们今天考虑应当如何评价某些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时，对苏联人曾经走过的道路必须仔细回顾并引以为戒。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刘爽，2009：序2）。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读中国革命史、思考建国60年史和评价中国历史人物时所必须牢记在心的。

最后，我想需要从有偏见、非理性的传统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的，也并不只是中国人。为了世界的和谐，我觉得美国人也十分需要“解套”。一百多年来，他们受“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的影响太深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时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一定



民意基础的。“冷战”思维，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圣战”的意识，在不少美国国民心中根深蒂固，能够“不战而胜”当然最好，否则美国人是愿意为了“自由世界”在全球的胜利付出代价的，而且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为了“民主制度”的胜利，派兵、开战、杀人、放火都是可以的。只有到了未来的某一天，美国民众开始了解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基督教的理想一样，也有美好和神圣的人类普世价值追求的内涵，也包含着对人权、平等和自由的追求，那时他们才能从“冷战”思维和对“共产党国家”的绝对负面的思维定式中解套。只有到了那一天，美国人才有可能真正客观地认识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放弃在中国等国家推动“颜色革命”之类的圣战活动，才有可能放弃以“民主制度”去“解放世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只有在接受了“和而不同”的共处理念之后，美国人才不会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样的泥淖，美国才有可能与其他的文明和平相处。当然，那是美国人自己需要担心的事，就用不着我们中国人去为他们操心了。

参考书目：

- B. A. 利西奇金，2003，《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启超，2000，《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刘爽，2009，《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尼·伊·雷日科夫，2008，《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
张捷，2007，“俄罗斯开始重评斯大林”，李慎明等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苏联历史的评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5-182页。
罗伊·麦德维杰夫，2005，《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 文】

族群冲突与公民社会：印度及印度以外的地方*

Ashutosh Varshney 著，秦长运译¹

关于“公民社会”和“族群冲突”，各自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但并没有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系统性尝试。² 我最近所做的基于印度的项目³和补充的非印度资料的研究表明，公民社会和族群冲突之间的连接问题应当得到认真的关注。不同族群共同体成员间的带有公民性质的相互接触（engagement）是否有助于抑制族群冲突？从族群冲突的角度来看，跨族群的接触与族群内部的接触是否不同？公民组织在族群关系紧张状态下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能够扮演这些角色？这些还尚未被系统研究过的问题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鉴于暴力冲突几乎成为很多

* 本文英文题目为“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 India and Beyond”，刊载于 *World Politics*, Vol.53, Number 3, April 2001, pp. 362-398. 作者任教于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

¹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² 这并不是说族群内共同体生活不是公民社会研究的一部分。最近的、但不是唯一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即是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 *What It Means to Be American?* (New York: Marsilio, 1992)。族群（或宗教）共同体生活具有公民性质的观点，曾被很多人质疑。第 I 节对这些争论做了总结。

³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